
中國歷史文化地理

上 冊

陳正祥 著

中國研究叢書第 2 號

中國歷史文化地理

上 冊

陳 正 祥 著

台北南天書局出版

中國歷史文化地理/陳正祥著. -- 初版. -- 臺
北市：南天，民84 -
冊； 公分. -- (中國研究叢書；第2號)
含索引
ISBN 957-638-336-6 (上册：精裝)

1. 中國 - 歷史地理

669

84009603

中國歷史文化地理 (上册)

定價新台幣800元

民國八十四年十月初版一刷發行

著者：陳 正 祥
發行者：魏 德 文
發行所：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83巷14弄14號
☎ (886-2)362-0190 電傳Fax：(886-2)362-3834
郵政劃撥：01080538號 (南天書局帳戶)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436號

著作權所有
翻印必究

製版廠：豪華彩色製版有限公司
☎ (02)309-1235 台北市西園路2段279之7號4樓
印刷廠：皇甫彩藝印刷有限公司
☎ (02)303-5871 台北市長泰街297巷14號

ISBN 957-638-336-6

謹以此書 紀念姑母

姑母是祖父母的獨女，排行第三。她的兩位兄長，在東京讀書時奔走革命失蹤，她後面的兩個弟弟，居長的是我父親。她十九歲出嫁，二十二歲開始守寡。祖母說那些年家境很淒慘，祖父從西樓搬住東樓，將最好的房間讓給姑母，並用楠木修建了佛堂，給姑母讀書念經。她虔誠拜佛，研究佛學。偶爾回家處理要事，多數時間住在我們家裡。每年陪同祖母到名山進香，我第一次遊覽普陀山，便是跟姑母去的。

姑母閱讀的古書，似較全家任何人多。我看古書遇到不明白處，喜歡求姑母講解；這除了講得細心外，她房中經常有最好的點心。祖母曾說：「你姑母如要月亮，你爺爺會架雲梯登天摘下來給她。」她是全家上下愛護的核心。

當時江南一帶有許多望族，除圖書外也收藏字畫，數量且頗可觀，形成星羅棋佈的文化小中心。各家圖書可以互借，古文物共賞，園林陪遊覽；學人往返，書香飄逸，精英輩出，文風盛極一時。由於比較觀察多了，姑母鑑賞字畫有獨到之處，為時人所重。我對歷史和文化的一些原始興趣，主要受姑母博學的影響。

本書的部分篇章，曾在1981年出版了《中國文化地理》一書，同時有香港、北京、台北和漢城的版本。扉頁標註用以紀念何伊人，她是姑母獨女順柳表姊的好學生，經常跟表姊到我家來，有時住得頗久，相處好像一家人。所以我用此書來紀念姑母，意義是雙重的。

自序

太空攝影技術的發明，可從人造衛星拍攝地球的相片，這對地科學的衝擊很大。當我收到第一批地球照片時，沉默了好一陣子；秘書笑問這是怎麼回事，我說這是有關科技的無聲革命，影響深遠。

六十年代末期，世界農業地理委員會正忙於編印五大卷《世界土地利用》的研究報告，所消耗的人力和物力頗為可觀；此一發明的成果如提早兩三年公佈，我們便可節省很多時間和精力。委員會的另一委員，西德特羅爾(Carl Troll)教授較早聽到消息，曾同我認真討論此事。現在我先看到了實物，當天就用電話通知了他，他說會儘快來看，商討對策。

我覺得自己從此應該多作歷史和文化地理方面的研究，輕鬆一下頭腦，而讓年青人去追趕時代。時代實在變化得太快太多了。

此項研究詣趣的轉變，可從我的著作目錄看出來。先前零星收集的資料，包括人口和物產統計，乃至進士及詩人的籍貫分佈，至此統統有了用場。我繪製了歷代人口分佈和人口密度，以及茶葉和礦產之類的產區分佈圖，共計六十多幅；都是歷史學家從未見過的。1981年再訪北京大學，坐鎮北大地理系的侯仁之教授看了這些圖，不得不又感嘆地說：「你總是走在我們前面！」。

點繪人口分佈不難，欲求人口密度就先要有可靠的行政區劃圖；你見過漢唐的州郡地圖嗎？分縣地圖就更談不到了。州郡下面轄有縣，有記錄可查，可把所有的縣治都按上地圖；但如何把州郡界限畫出來，就極困難，於是太空照相派上了用場。分界線劃定之後，還得用求積儀測量，測量五次取其平均數值。作成人口密度圖之後，尚須和周圍州郡比較，審查是否合理。我在東京出版《中國歷史與文化地理圖冊》的自序，對如何創製人口地圖有詳盡的說明。

1958年我應日本學術振興會之邀前往講學和指導研究一年，把所繪製的歷史與文化地圖都帶去了，使令朋友們感到驚喜。東洋文庫庫長榎一雄說：「這些正是東洋史家所渴望和期待的。過去有人想作而作不出來。已見的只限於沿革地圖。」日本國土小而科技發達，學人之間信息靈通，我這次攜帶許多“珍貴有趣地圖”的消息，很快就傳開了；我尚未到達京都，京都的朋友竟先知道了。

按照日本學術振興會安排的行程，我首先去了筑波。這是新興的科學城，日本的國土地理院設在這裡。它是日本地理學界最高的的領導機構，前後兩任院長都是我朋友。此一機構統管日本的地圖，高崎正義院長看到了國際研究中國之家出版的盒裝地圖，立刻想複製成幻燈片，說給我一套帶着演講用，一套由他們保存。他又請求給他們全院工

作人員講演一次，經我同意之後，翌日下午就召開了我那次訪問日本的首次講演會，會後高崎親自陪我參觀了尚在保密的電腦繪圖。

去京都須先回東京，過東京時電話告訴榎一雄兄，說明我在筑波多耽了兩天的原因；沒有時間再去看他了，待從廣島東歸時再見。不意他說已知會東京大學的老學生，為我召開東洋史地圖宣佈會；因他原是東大東洋史教授，日本著名的東洋史學家，幾乎全是他的學生。我告訴他所攜89幅地圖都製成了幻燈片，他說好極了，但應該將中國蝗災分佈圖加進去，湊足90幅。那次在東京大學舉行的講演會非常熱鬧，時間之長和人數之多都是空前的，坐一二排的有不少白頭的老朋友。這事已經有人報導過了。

榎一雄的念念不忘中國蝗災分佈圖是有淵源的。我利用方志記載的八蜡廟追溯蝗災，曾在東洋文庫查閱方志，他聽過我的解說後就讚嘆這是一項發明。我1964年就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的“就職講演”(Inaugural Address)，曾提到這幅地圖繪製的經過；講演稿出版後寄贈他一冊，他回了一封長信，說為文庫珍藏方志能得到我這樣的人善加利用而高興，又問何以要直等到我才知道把迷信同科學結合起來？

廣島之成為我這次講學的最西點，而滯留的時間又最長，主要是因為這座又名鯉城、第一個吃原子彈的城市，聚集了我很多好朋友，還包括1957年我在仙台東北大學講學時的特別助手藤原健藏；他繼米倉、石田兩位教授之後任廣島大學地理系主任，三代人都成為我極要好的朋友，友情特別溫暖。藤原君領隊到南極考察，曾為我帶回一塊重3.6公斤的花崗片麻岩(Granitic gneiss)，因為他知道我喜愛收集岩石。他在布袋上用紅字書寫“謹呈陳老師”，放在研究室內等待我兩年多。此外他還為我帶來一個企鵝標本，說是給我孫子的，可我那有孫兒呢！日本早先學人懷舊之情以及對長輩的心意，彌足珍貴。日本也有很好的一面。

我到達廣島第二天，就開始正式講演。接著有盛大的歡迎宴會，退休多年的米倉二郎，一早就從鄉間趕來，盛情可感。我所講的《中國文化中心的遷移》，隨即在廣島大學《地理科學》第32卷首篇登刊。這也就是本書的第一篇論文。

講演是不定期的，半個月或一個月一次，並事先通知鄰近的幾間大學。聽講者有來自福岡、山口、岡山等地。多年前曾寄贈巨著《唐代邸店》的岡崎敬教授，有次也從福岡來了，我把盒裝圖冊中的唐代地圖都送給了他，他非常高興。他說：「你的講演稿應集成為書，所有這些創製地圖，是全日本所有對中國歷史文化有興趣的人都想看的，也應該出版讓大家共享。」後來東京原書房出版了我的《中國歷史與文化地理圖冊》，據說就是東京、京都、福岡、廣島等處許多教授朋友促成的。該書定價高達28,000日圓，竟能在不到八個月的時間賣完第一版，被日本學術界視為美談。

1981年我應母校南京大學(原中央大學)之邀回去講學四十二天，是和早稻田大學應邀的青木茂男教授同時到達上海的，同住錦江飯店。第二天中午在餐廳吃飯時，他跑

來同我打招呼，我問他如何知道是我，彼此從未謀面。他說在地圖冊的著者介紹中看過我的照片。日本人讀書是經常“越界”的，他說我的這些地圖富有經濟史價值，他也購買了一冊。就他所知，早稻田大學同人中至少已有八人購買了此書。日本人和中國人的最大不同，就在乎讀書和不讀書！後來我又回到日本，他還兩次來帝國飯店探訪我；第二次並帶我夜遊淺草區，請我吃了一頓道地的日本宵夜。

我在南京大學講學時也選用了一些歷史文化地圖。據說是一位旁聽的著名人物說服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中國文化地理》的內地版。1983年12月初版印了9,200冊，預約的佔去了8,800冊，坊間很快就斷市了。我書房中原有兩冊，現在也只剩下一冊了。銷量最大的，倒是台北盜印的縮小本，聽說翻印了三次。1986年2月孫得雄航寄了一冊給我，才知道此書已流入台灣。

隔頁是1981年香港三聯書店初版的自序，係1980年9月25日寫於廣島。它嚴厲評擊了英國發動醜惡鴉片戰爭的滔天罪行。香港唯一比較有良心的總督尤德，1984年1月7日給我的信中，開頭說：I very much enjoyed reading your book “Chinese Cultural Geography” and was fascinated by the article it contain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Ba Cha Miao and the temples dedicated to General Liu Meng. In the map on page 53, which shows their distribution, there are a number which appear to be in the vicinity of Peking. I lived there for many years but do not recall seeing a temple dedicated to the spirit of the locust, but this may simply mean that I did not go to the right place.

我同尤德會見過許多次，我住處距離他的粉嶺別墅不遠，中間只隔着高爾夫球場。他夫婦倆都精通中文，書房中有十多本我的著作。絕大多數香港人是不讀書的，但他們的總督卻細心閱讀我的著作，而且這樣深入。我特別欣賞他能用fascinated來形容閱讀我書的感受，這和日本東洋文庫長榎一雄在給我信中所用的讚美詞很接近，足證尤德也是頗有學問的人。他還頗有雅量，不但不恨我痛責英夷（我全書用英夷代替英國人），還想將此書譯成英文。他當時的好意，是書內無數痛罵英國人的全部保留，只希望自序的第三段略予修改，我立刻拒絕了。拒絕的另一用意，是此書寫作實在太匆促了，現在覺得必須徹底重寫。

《中國文化地理》一書的扉頁，原有「謹以此書；紀念伊人」字樣，其下並有如下的五行字，是評擊日本軍國主義者無端侵略中國罪行的。伊人則是我青梅竹馬的女友何伊人。

謹以此書 紀念伊人

如果沒有日本軍國主義者無端發動瘋狂的侵華戰爭，她決不會病死在荒僻的深山；如果不是日本兵空前殘酷的燒殺淫掠，我不致匆忙離開西子湖邊逃難到了松林坡下；又如果不是

日本帝國的戰敗投降，我絕少有機會來台灣進行長期的研究和調查。假如沒有這一切，我可能有一極美滿的家，以及成群受良好教養的兒孫——漢文化的真正繼承者。而現在呢？除了國際地理學界的虛名，我一無所有；所剩下的，唯有回憶、失望、惆悵和哀傷！

在該書和上述圖冊出版的同時，東京和京都都有朋友囑咐他們的老學生，組織班子合譯我的書。這些老朋友包括榎一雄和貝塚茂樹等，同時又建議翻譯我的另一著作《草原帝國》，認為該書很不尋常。我感激他們的古道熱腸，但當經手執行者希望我刪去扉頁的獻辭，我同樣搖頭拒絕。

一位能言善道的中年助教授，說我的生活太嚴肅了，也太重情義了。大家希望我忘卻哀傷，免得影響健康。又說我的健康長壽是很重要的，受到很多人關注。我真的聽不少日本朋友提起過，日本學術界高層有我不少朋友，都說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像我這樣工作的。是的，我對工作的投入程度可能和常人不同。我原可享受歡樂的生活，卻也有無窮盡的哀傷。長期以來，我一直認為這一代的中國人，非但不配講求享樂，連哀傷也要節抑。每一個人都必須加倍努力工作，多想想國家的榮辱和民族的前途，而不把生命浪費在無休止的鬥爭上。在既往的長時期裡，生存環境擠逼的中國人，被民賊誤導而進行不斷的鬥爭，已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了無比的創傷。

我還有大量的研究和著述要完成，有數不清的被麻痺的愚民要喚醒，數十年來抱定忍讓，犧牲一切而不與人爭，不願浪費滴點的精力和時間。

本書所附插的圖片，全部由國際研究中國之家提供。

1994年6月7日於格城

《中國文化地理》原自序

中國文化是全世界延續最久、影響最大的文化，它發源於黃土地帶，然後向周邊擴散；波及整個東亞和東南亞，並向西伸入西域。在秦漢和唐宋時代，中國文化曾發放無比的光輝。自北宋王朝滅亡，漢文化開始失落；但在廣闊的漢文化圈內，經濟開拓繼續向南方發展，生產技術仍不斷有所改進。

漢文化基本上是農耕文化，特別是水稻的栽培。稻米是人類最好的糧食。漢文化愛好和平，努力建造城池來抵禦侵略。大批城池成爲中國特有的地理景觀。

農業的高度發展，需要適當的水熱條件。中國文化中心的從西北移向東南，一方面固然是不斷受到游牧民族的壓力，但也受到東南地區較佳生產條件的吸引。科學實驗知識告訴我們，在同樣的耕作技術下，愈炎熱濕潤的地方，農業生產的效果愈好。但當然也有限制。從華南而南洋，乃至澳洲的北部，都很適宜漢文化的發展；又因爲漢文化是緩進的、和平的，它的自然發展會給各地的原居民帶來安定和繁榮。唯此項自然發展，受到了歐洲人侵略勢力的阻撓。

十五世紀初葉明朝偉大航海事業的中止，是漢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捩點；中國的勢力從印度洋和東非洲退縮，給歐洲人以機會，讓他們紛紛搶奪新世界。明代中後期蒙古殘餘勢力的侵擾長城內外，日本人祖先倭寇的不斷襲擊東南沿海；兩面夾攻，更削弱了中國的勢力。亞洲人內爭方殷，歐洲人傾巢而出，侵佔了全部所謂新土地。這是漢文化和歐西文明發生差距乃至優劣倒置的基本原因。到了十八、十九世紀之交，歐洲的殘暴勢力終於侵入亞洲。

歐洲人要掠奪亞洲的資源，並確保新侵佔的土地，關鍵在乎能否阻擋中國勢力的南下。因爲當時在力量的對比上，可能抵抗他們邪惡勢力的便只剩下古老的漢文化。於是他們首先殘酷的屠殺漢文化前哨城市像馬尼刺、巴達維亞等地的華僑，後來又想出利用鴉片毒害中國的狠辦法。英國人大作鴉片生意，先摧毀中國人的健康，再麻痺中國人的意志，然後繼之以真刀真槍，劫掠中華大地美好文物，並且破壞不能搬走的！

鴉片戰爭對漢文化的打擊是空前的，它揭穿了當時中國人的虛弱，破壞漢文化在東亞和東南亞的傳統突出形象；科學和技術的相形見拙，使有煙毒後遺症的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從此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力量，無法繼續向南擴張。中國過剩的大量人口無法向外移殖，接著連漢文化本身，也受到了可怕的腐蝕，直到今天！漢文化圈的外圍，包括日本、朝鮮和越南等，一向崇尚漢文化的，都遭遇極大的震盪；開始懷疑這古老文化的優越性，爭相擺脫漢文化的影響，轉而接受歐西的文明。日本的明治維新以及稍後的所謂日英同盟，都是鴉片戰爭的附屬產品。

優美中國文化的如此失落，好似美滿家庭因不肖子弟吸食鴉片而突然破產，曾長期令人迷惘！中國文化經受這惡毒的打擊，難道永遠不得翻身？我不相信。漢文化如果真的不能復興，中國人就要永遠作世界的二等公民！於是我發奮努力，多多旅行，用功讀書，一直使自己在地理學研究上遙遙領先，最後主持了包括各國家專學者的國際農業地理委員會。我給北非各國考察並指導沙漠灌溉，首先把中國人的影響力帶回非洲！

據說我還是第一個直接選任英制大學講座教授的人，但我從來不講求這些！我只作每一個知恥中國人應作的事。1952年美國地理學會慶祝創會一百週年招請的地理學家，我是亞洲的四人之一；1957年日本承擔召開國際地理學會首次在亞洲舉辦的區域會議，因其時未脫窮困，國家科學院發表的邀請名單僅有十一人，我是亞洲的兩人之一；1959年是現代地理學之父洪包德逝世一百週年，柏林地理學會聯同國際地理學會邀請的亞洲學者，我是三人中之一，並且是全體一百人中最年輕的一人。這些我作到了，其他只會空喊復興漢文化的人，又作出了一些什麼貢獻？

我從台北轉職到了香港，很想對鴉片戰爭的發源地作一番實地考察。英國人以香港作基地，對中國欺辱搜括了一百多年，我誤認他們已知罪疚深重，要從事懺悔，想作點善事，才創辦這所新大學，我可能對此作出貢獻。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到香港後不久，便發覺鴉片戰爭的邪惡意識及犯罪形象依然存在！

要挽救漢文化的沉淪，阻止它的繼續被腐蝕，進而恢復它固有的光輝，我想這一代的中國人實應負擔較多的責任。為達成此項目標，首先要認識中國文化，而我願以身作則。我一直是唸理科的，有了這個信念之後，就得改變我的研究方向，用文史哲的知識代替腦海裏的符號同公式。有幾段頗長的時期，我只讀中國的古書，樂而忘倦；所訂購的科學書刊，任其塵封。終因文史的根基不夠好，進步甚為緩慢。所寫的有關論文，多數屬於嚐試性質。

本書所收的十篇文章，大部分發表過，但不見得都很成熟。第一篇《中國文化中心的遷移》，是1979年在日本廣島大學和國土地理院的講稿，稍後又刊載廣島大學《地理科學》季刊第32期。第二篇《方志的地理學價值》是1964年我就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時的就職演說，也就是英國制大學的所謂 *Inaugural Address*，曾經由該大學印刷發行。第四篇《北京的城市發展》，是國際研究中國之家於1977年出版《中國研究叢書》第三號《北京》一書的摘要。第六篇《長城和大運河》是劫餘殘卷，我在過去三十年間，對長城和大運河曾收集大批資料，包括地圖和照片，兩者皆可單獨成書；但1977年底離開中文大學時，大部分稿子都不見了。大運河的因為摘要油印過，部分賴以保存。第八篇《台灣的地名——文化層分期》曾作為數明產業地理研究所研究報告第104號發表過，日文節譯刊載京都大學《人文地理》第十二卷第五期。第九篇《諸羅縣志之例》，曾發表於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文獻》第九卷。上述幾篇文章，皆或多或少經過了修訂。

第十篇《中國歷史與文化地理圖冊的完成》，是1979年對廣島大學有關研究生及教職員所作的歡迎聚餐前的講演，講稿曾經複印流傳。那次講演和宴會，有好幾位退休多年的老朋友從鄉間趕來參加，特別令人感動。

在學習過程中，我體會到文化地理和歷史地理實難以嚴格劃分；譬如地名，它是文化地理的一個構成部分，但卻追隨歷史而不斷改變。我最近所寫的另外七八篇論文，體系倒比較完整，有朋友勸我應先發表《中國歷史地理》一書。但我總覺得中國靠歷史吃飯的人太多，對此應該特別小心謹慎；同時內地近年從地下發掘出了許多古文物，必定有一些可充實我的歷史地理著作，不妨再等待數年。因此才決定先出版這一本書。我知道應該提到而未能觸及之處尚多，可是我目前的研究工作實在太忙，無法面面顧到；若有缺失或不妥當，希望讀者指點和批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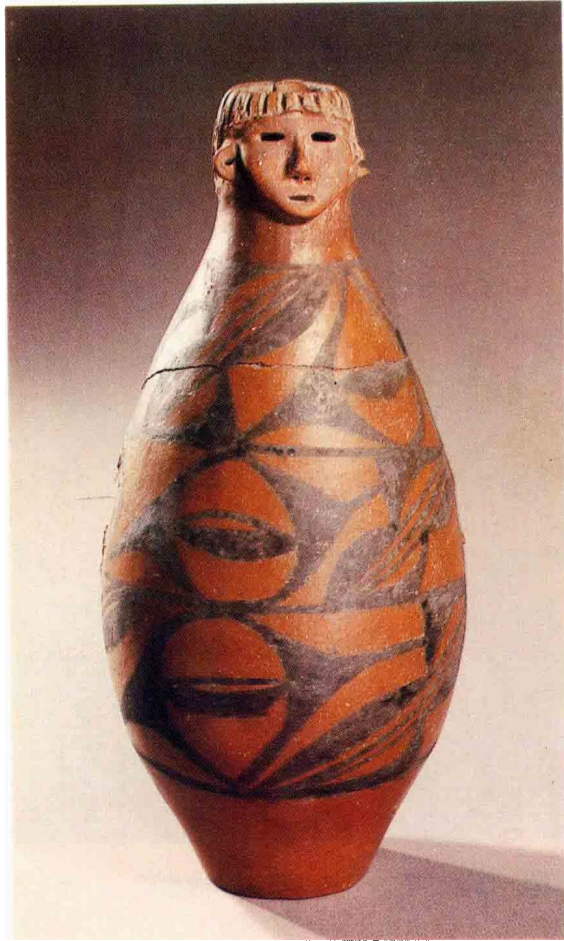
我的研究考察旅行，尤其是在東亞，使我深信漢文化並非單獨屬於中國人，而是為整個東亞人民所共有。我和我的許多日本朋友，都認定漢文化是很優美的文化，特別是在精神感召方面，否則它不可能延續得這麼長久；漢文化圈是一個偉大的地理單元，否則它不可能養活十二億人口。由於背棄漢文化，使得今日社會道德遭受嚴重損害的，也決不限於中國人。在物質慾望高漲，禮義廉恥全面淪喪的現代化社會，已經有人在追憶古老漢文化的美好了。

放眼世界，局勢激盪。我呼籲廣大漢文化圈人民的大團結，用較大的經濟、文化聯合力量，迎接非常艱難但也可能轉運的二十一世紀。我們要忘卻過去的是是非非，而努力爭取將來。日本人應該放蕩胸懷，盡量消除因狹窄生存空間所產生的偏激。我們應該互相瞭解，加強合作。我一直就想通過我的學術研究，特別是文化地理的研究，能對促進漢文化圈人民的瞭解和合作有所貢獻。或許也就是這個心願，才引導我在艱苦的環境中不斷努力工作。

1980年9月25日於日本廣島



新石器時代魚蛙彩陶 仰韶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半坡類型，口徑35厘米，陝西省臨潼縣姜寨遺址出土



新石器時代人形彩陶 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高31.8厘米，甘肅省東邊秦安縣大地灣遺址出土



馬家窖原始文化半山類型彩陶 高27厘米，甘肅省會寧縣出土，現藏會寧縣文化館



大汶口文化的彩陶 高26厘米，山東省泰安縣大汶口出土。其南二百多公里江蘇省邳縣大墩子，曾出土幾乎完全相同的彩陶。

大汶口文化是黃河下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因1959年發掘的泰安縣大汶口遺址而得名。主要分佈在山東省泰山周圍地區，東到黃海之濱，北抵渤海南岸，西自魯西平原東部邊緣，南及江蘇省淮河以北地帶；此外在安徽省與河南省也曾零星發現。年代約從公元前4300年開始，到公元前約2500年發展為山東龍山文化。

大汶口文化的經濟以原始農業為主，主要農作物為粟。陶器以灰砂紅陶和泥質紅陶為多，也有灰陶、黑陶和少量硬質白陶。迄今已發現的遺址約有200處。

大汶口文化的發現及其和山東龍山文化繼承關係的確定，證明當時魯南和蘇北一帶，是一個以大汶口文化、山東龍山文化為主體的自成系統的文化區。



紅山文化遺物 此一用藍色玉片嵌眼的泥質女神像，約有5,500年歷史，說明遼西地區是極古老的另一文化核心



商代末期到周朝初年的青銅人像 成都沖積扇北側廣漢市三星堆出土，顯示西蜀存在另一古老文化中心，證實了我1955年發表《農作的演進與傳播》時所說的中國文化多元論